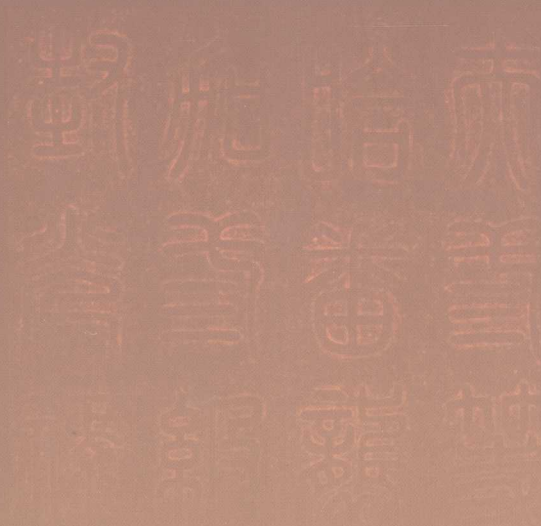


郭沫若 考古文论

陈仕益 著

GUO MO RUO KAO GU WEN LUN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郭沫若 考古文论

陈仕益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沫若考古文论 / 陈仕益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5
ISBN 978-7-80752-369-7

I. 郭… II. 陈…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241 号

郭沫若考古文论

GUOMORUO KAOGU WENLUN

陈仕益 著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4

字 数 3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369-7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追溯郭沫若的考古历程（代序）

让我们从考古学的概念说起。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1](P1)}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田野调查发掘和文化遗存研究两个组成部分。文化遗存是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的统称。其中，文化遗迹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不可移动的文化遗存，如房屋、村落、道路、运河、墓葬等；文化遗物则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可以移动的文化遗存，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器、兵器等类别，按质料可分为石器、玉器、陶器、骨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竹器、木器、漆器、丝棉制品等类别。郭沫若本人在卷十 P5（“卷十”指《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十卷。以下凡是出自《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的引语，一律仿此，省略书名，只标卷号与页码、卷号与文题或卷号与甲骨文的片码）也从若干角度揭示过“考古学”的内涵：“这种学问是要以纯粹的客观的态度，由地面或地底取出古人所遗下的物证来，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考察出人类的文化从古以来所历进着的过程。这种学问是正确的史观之母体或其裸母，而对于向来的仅据不尽可靠的文献站在种种利害的立场上所捏造出的旧

式史观是处在对蹠的地位。”

郭沫若是考古学家。人们习惯上认为，所谓考古工作者或考古学家，是指从事田野考古的人。郭沫若以室内考古研究名世，很少田野考古的经历；他考古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其中的大宗——甲骨文和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非发掘品。既然如此，他“考古学家”的称号从何而来？答案是：文化遗存的室内研究仍然属于考古学的范畴。郭沫若在辩证唯物论和现代考古学理论的指导下，不仅把金石学和古器物学改造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而且取得了高于同时代考古学家的成就。所以我们说，郭沫若研究的就是考古学，他不仅是考古学家，而且是其中的翘楚^{[2](P1)}。

从1928年8月开始接触甲骨文，到1978年6月逝世，郭沫若与考古学相伴了整整五十周年，在历史遗存的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饮誉海内外。

一 东瀛十载展华章

1928年8月到1937年7月，是郭沫若考古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只有九整年，但占了十个年头。为方便计，以下一律以“十年”相称。对郭沫若来说，这是辉煌的海外十年。十年里，他没有过渡期，直接就一鸣惊人，在考古研究领域连连告捷，从平地跃升到了他考古研究的顶峰；他异军突起，以雄健的步伐，迅捷地跨过考古学家们的现有阵地，把学科研究的战线推进到了更具前瞻性的领域。

（一）考古研究的缘起

北伐战争中，因为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郭沫若于1928年2月27日亡命日本。从这时起到同年7月，他一直在进行着多种读写尝试，以探求未来的工作方向。一方面，他大量阅读科学的文艺论著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出版了《恢复》、《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与成仿吾合作）、《水平线下》、《水平线下全集》、《沫若译诗集》、《沫若诗集》等著作，创作了《我的幼年》等作品。但他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古代，开始历史研究（这里的历史研究，是就其狭义而言的，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同年7月31日，他写出了第一篇上古史研究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8月25日，写出了第二篇古史研究论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为了历史研究的需要，紧接着，他又开始攻读甲骨、金石文字，进行考古研究。

郭沫若曾经说过：“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3] (P10)}可见，狭义的历史研究是郭沫若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考古研究又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自然延伸。既然如此，可知郭沫若考古研究的缘起与其狭义历史研究的缘起相同。

（二）考古研究的理论准备

作为一个成熟而自觉的革命者，作为五四以来相继冲锋在文

武两个战场最前线的革命战士，郭沫若非常注重用先进的哲学理论来提高认识，用先进的学科理论来指导工作，他的考古研究也不例外。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

1924年5月下旬，郭沫若译完日本人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同年，他还向商务印书馆提出五年全译《资本论》的计划，但商务印书馆不敢答应。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他多次致信友人谈自己的思想转化问题。如7月22日致信何公敢，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益见坚固”，“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认为“现在所当讨论或者实行的便是如何造成一种力量来推倒政府，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4](P152)}。8月9日夜致信成仿吾：“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4](P153)}

回国以后，郭沫若1926年3月任教广东大学时向中共广东大学总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要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段时间，因此，同年7月他参加了北伐战争。11月，在南昌北伐军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他再次申请入党。1927年8月17日，南昌起义部队抵达广昌，他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与贺龙、彭泽民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开始考古研究时的郭沫若，已经是一个经受了革命战争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政治理论和生活经历上的准备，与郭沫若新锐的研究目的跟非凡的才华相结合，足以使郭沫若的考古研究别开生面，使其成果出人头地。

2. 考古学理论的准备

在此以前，郭沫若早就读过《尔雅》、《说文》、《群经音韵》等典籍，接受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训练。就读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时，他进一步受到了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懂得整理材料、分析问题、构筑体系的方法及其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基本功，为他的考古研究奠定了深层基础。

一开始考古研究，郭沫若便注重学习考古学理论。据他自己说，在考古研究的入门阶段，他就差不多读完了东洋文库里关于中国境内考古学的资料。但他仍感不足，渴望获得考古学的系统知识。于是，1929年他边学习边转译了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博士所译的德国米海里斯著《美术考古发现史》（1931年版改名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48年版再次改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读此书的意义是巨大的。郭沫若在《序美术考古一世纪》里说：“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若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卷十 P21）这些话不是诗人的一时冲动之言，《序美术考古一世纪》里列举的大量证据和洋溢着的感激之情可以作证，郭沫若在《美术考古一世纪》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之下所写的那么多考古学著述可以作证。

（三）考古研究的坚毅征程

郭沫若流亡日本的考古研究成果，是他艰辛求索、十年专注的结晶。

艰辛求索 考古研究能够实现心中的理想，却很难同时获足全家的衣食之资。故郭沫若在追求考古成效的前提下，只能加紧

创作翻译活动，以维持家庭的最低开销。但卖文为生，心力两倦。这可屡见于郭沫若致友人的书信中。如1929年12月24日致容庚：“弟受沪上书贾之托，正从事迻译西书以为笔砚资，须至二月中旬始能蒇事。甲骨文稿不能不暂时中辍。”^{[5](P37)}1931年3月20日致容庚：“召伯虎二簠前人未得其读，弟颇有别见，拟作《召伯虎二簠铭与江汉篇之比较研究》一文以论之，恨目前为糊口文字百忙，毫无寸晷耳。”^{[5](P94)}1935年致谢六逸：“目前因为翻译一部大东西，弄得颇有点筋疲力尽。”^{[6](P415)}即便如此，资费有时也难以续接。如1933年3月2日致叶灵凤：“我的版税能在‘每月十日汇出’最好，望勿失信，因在此羁旅，困苦有难言处，有弟此书厚谊，实精神上之莫大慰安也。”^{[6](P386)}一有不虞，就只有请求预支稿费、版税。如1936年某日致陶亢德：“（《北伐途次》）如可发表时，发表费能一次寄给我最好，因为我在右胸侧生了一个碗大的痈，已决心进医院去割治。如一次寄不足，能先寄两百元来也好。”^{[6](P414)}1931年4月19日致容庚：“弟有友人新由此间縲绁中出，患盲肠炎，须入院行手术，药石之费，苦无着落。曩岁兄曾言孟真有印弟《甲骨文释》意（按《甲骨文释》是《甲骨文字研究》的初名），今欲将近著《两周金文辞通纂》（按即《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初名）相浼，署名用鼎堂，愿能预支版税日币四、五百圆，望兄便为提及。”^{[5](P96)}在此一年多以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字孟真）要郭沫若用化名（因郭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才愿意出版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曾以不食周粟轻蔑地相拒^{[5](P47)}，拂袖而去，在上海另找了出版单位。而今急需用钱，又不得不低下高昂着的头，把稿子送上门去，主动要求化名出版。想来，“羞愧”、“绝望”之类的字眼断难表达铜钱玷污灵魂引起的心灵伤痛。但这就是生活！

十年专注 郭沫若是一个多面天才，爱好广泛，很难把精力长期集中于某一个领域。但十年流亡，他的主要精力却都倾注到了考古研究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奇观。再进一步考察，郭沫若不仅十年专注，而且十年中时时专注。比如，他集中精力、不到两月便读破了甲骨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28年8月，郭沫若发现传世上古文献不可尽信，毅然代之以未经后人改动的甲骨文作为上古史研究资料，决心要“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4] (P232)}。到东京的书店打听，才知道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四册）要四百元，他自嘲寒士要靠买那样的书当学者，未免有点僭妄；但他并不罢休，转而拜托上海的朋友代购罗振玉著、价值十多元钱的《殷墟书契考释》。读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继而前往东京上野图书馆、文求堂访寻著录原文性的书籍。“后来又由友人的介绍到东京的东洋文库去阅览。……在九、十两月，除掉礼拜而外，几乎天天都跑东京——我住的地方是在东京邻县的一座小村落里。就那样，仅仅费了四五十天的工夫，把所有关于古器物古文字之类的著作便完全读破了。”（卷十 P11）直到今天，郭沫若两月读破甲骨文的神话依然为人津津乐道。时时专注，郭沫若的考古研究才得以连连告捷；十年专注，他才得以集腋成裘，堆叠起雄浑高峻的考古学群峰。

（四）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

十年苦读，使郭沫若的考古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质高量大，形成了《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的主体。它们是：第一卷中的《甲骨文字研究》（1931）和《殷契余论》（1934）两个论文集，第二卷《卜辞通纂》（1933），第三卷《殷契粹编》

(1937), 第四卷中的论文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 第五卷《金文丛考》(其中的几个论文集分别初版于1932、1933、1934年), 第六卷《金文丛考·补录》中的《正考父鼎铭辨伪》一文(1934), 第七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 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6), 第九卷中的《石鼓文研究》(1936年撰写, 1939年初版), 第十卷《考古论集》中的《我与考古学》(1936)、《序甲骨文辨证》(1936)、《龟兹刻石》(1933)和《熹平石经鲁诗残石》(1933)。以上研究成果在郭沫若一生同类成果中的比重, 据笔者统计, 占了80%左右。

对比郭沫若流亡十年研究甲骨文、金文这两种主要的古文字资料的情况, 我们又可以发现两种不同。1. 就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时间分布说, 甲骨文研究呈点状分布, 金文研究呈线状分布。1928—1929年, 郭沫若撰写《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甲骨文字研究》; 1933年, 出版《卜辞通纂》和《殷契佚论》; 1937年, 出版《殷契粹编》。十年之中, 他的研究以甲骨文始, 以甲骨文终, 但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 且三段之间有较大间隔。而金文研究则不是这样。从1929年11月作《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到1935年8月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六年之中, 撰写、出版、刊发, 络绎不绝, 很少长期中断。2. 从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的总量看, 甲骨文少, 金文多。《考古编》十卷5600页, 一卷至三卷是甲骨文著作, 其中属流亡十年的共计1841页, 占作者五十年里针对甲、金、玉、石、竹、帛等各类文化遗存所写考古研究著作的40%; 四卷至八卷是金文著作, 其中属流亡十年的共计2297页, 占作者五十年里针对甲、金、玉、石、竹、帛等各类文化遗存所写考古研究著作的50%。

（五）考古研究中的人事活动

郭沫若流亡期间，孤悬异国乡下，从事个体精神生产，受到日本宪兵和刑士的双重监视，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为了考古研究的需要，他仍然努力冲破枷锁，积极寻觅知音。

据初步统计，十年流亡期间，因为考古研究的需要，郭沫若与容庚、张元济、成仿吾、李一氓、马衡、董作宾、金祖同、于省吾、张政烺等中国学人有以信函往还为主要方式的交往。张元济因为与郭沫若互赠考古研究书籍而有过交往，成仿吾因为从德国购寄郭沫若需要的《美术考古发现史》而与郭沫若产生了交往，马衡、董作宾、于省吾、张政烺都因学术讨论与郭沫若有过不多的一些书信交往，这些交往对郭沫若的考古研究没有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但其余三人与郭沫若的交往对他的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就不可等闲视之了。比如，郭沫若的第一本古文字研究专著《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因为傅斯年的梗阻而引起郭沫若的震怒，但问题终究没有解决；郭沫若的第一本金文研究专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这时也还待字闺中。对于一个转向新领域、需要出示新成果以自证的海内闻人来说，这容易让人焦躁不安。这时，就是因为郭沫若北伐时代的秘书李一氓的交涉，《甲骨文字研究》才于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以手稿影印形式出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也于次月由同一书局以相同方式出版。李一氓的帮助犹如久旱甘霖，以至于年届四十、已有许多轰动性著作出版的郭沫若，在1932年1月的某个早上收到大东书局寄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样书各二十部时，也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中午，安娜夫人还特别煮了红豆饭庆

祝。金祖同是1936年开始师事郭沫若学习古文字的，不久又将上海著名收藏家刘体智的二十册《书契丛编》（共收甲骨文拓片二万八千多纸）商借给郭沫若使用，并协助郭沫若在一年之内据以完成了《殷契粹编》一书的编撰工作，使之得以于1937年5月初版于日本。金祖同一拜郭沫若为师，短期之内就对郭提供了许多重要帮助。而这一时期与郭沫若交往最多，交往的内涵最丰富，对郭沫若帮助最大的国内同道则是容庚。这可从《郭沫若书简——致容庚》一书所收郭沫若1929年8月27日到1935年11月28日致容庚先生的五十六封信中看出。据第一封信，郭沫若本不认识容庚，他是从商承祚编著的《殷墟文字类编》王国维“序”中知道容庚这个名字的，因为王“序”提到了当时治古文字学的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四位青年学者。他之所以单与容庚通信，可能因为容处于学术重镇，正在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与之交往所得或许更多。五十六封信内容丰富，主要包括：1. 倾诉情怀。如：“弟苦材料缺乏，复无可与谈者，殊闷闷也。”（1929年12月13日）^{[5]（P35）}又如：“蒙箴戒数语，甚铭感，往已悠悠，来事亦殊寂寂，特此耿耿寸心，欲一本至诚，为人类社会多少做些善事而已。古文字之学，最是系心事之一，惟惜资料过少，恨无用力之地也。”（1930年9月26日）^{[5]（P74）}2. 函借资料。这种内容最多。想当年，郭沫若在大夏大学教文学概论，备课无书，还能就近去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今居乡野，如此便宜亦无，但研究工作又必需，且无从购买或无钱购买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卜辞》之类的书籍和新出土的甲金文拓片等，就只有向容庚先生大量商借。3. 探讨学术，换阅新作。学术探讨多以甲骨文、金文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或理论问题（如铜器断代三原则等）为话题，新作换阅如郭寄所著《殷周

青铜器铭文研究》二册等与容庚，容寄所著《宝蕴楼彝器图录》、《秦始皇刻石考》、《鸟虫书补正》等与郭沫若。4. 寻求刊布。郭沫若的一些著作、论文都曾请容庚联系过出版发表事宜，其中一部分还由希望变成了现实。

据初步统计，流亡十年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研究的需要，与田中庆太郎、林泰辅、原田淑人等十多个日本友人有过交往，这些交往多是直接接触；此外，为了搜集甲骨文、金文资料等，还造访过日本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上述日本友人在与郭沫若的交往中所起作用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 为郭沫若的古代遗存室内研究提供方便。他们有：最初帮助郭沫若进入甲骨文领域的山上政义、藤村成吉、石田干之助，1932年郭沫若在北京等地寻访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时为其提供方便的林泰辅、中村不折、中岛崫山、内藤湖南、富冈君勃、原田淑人、梅原末治，1936年以《石鼓文》拓本全套照片换阅郭沫若借自刘体智的《书契丛编》的河井仙郎等。而最值一提的是田中庆太郎。从1928年秋二人初识到1937年郭沫若归国抗战的十年之中，郭沫若的考古研究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郭沫若的大部分考古研究专著（如《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馀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都由他的文求堂书店出版。虽然双方是商家与客户的关系，但既然合作能够持续十年，也就说明双方能在利益分割上基本达成一致。对比郭沫若与北京联系出书却长期未果、最终不欢而散，与上海的出版商为金钱问题时有争斗，我们就可以知道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之间还有业务往来以外的东西存在了。事实上，不仅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两家之间也常有往来。2. 为郭沫若的田野考古实践提供机会。1935年，考古学家

杉原庄介教授吸收郭沫若参加自己主持的须和田文化遗址发掘工作，双方的合作良好。这决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事情。郭沫若以室内考古名家，迄无田野考古的经历。杉原先生邀请郭沫若参与文化遗址的发掘，拓展了郭沫若的视野，印证了郭沫若的知识，为郭沫若获得教益提供了机会。3. 对郭沫若的考古研究成果表示推重。1934年春，西园寺公望先生因为郭沫若在古代研究方面的特殊成就，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他，称他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就搞出了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可见，作为考古学家的郭沫若这时已经获得了日本学界的知闻和尊重。

二 邦国卅年流餘韵

（一）永不捐弃的考古研究活动

从1937年7月归国抗战，到1978年6月长眠北京，四十年的漫长岁月（本为四十一年，为方便起见，兹举成数，下同）构成了郭沫若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随着郭沫若的跃上政治前台，相继承担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府的各种显职，肩负着繁巨的行政工作，他的人生内涵和生活秩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僻处乡曲、潜心学术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学术仍然以其惯性运动到了郭沫若生命的终点。随着一个又一个十年的过去，在其住宅的写字台前，在一些考古发掘的现场，在若干青铜器博物馆里，在和外国考古学家代表团会晤的接待室，直到1977年1月与考古工作者共同鉴定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时在自己的客厅中，我们都能不时看见郭沫若奋笔疾书考古论文的身影，看见他视察文物

工作时谈笑指顾的身影以及流连于古器物展厅品鉴藏品的身影。不过，他的考古研究活动在四十年中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已有几次较长的中断。第一次较长的中断发生在他 1937 年回国到 1940 年 4 月在重庆江北培善桥试掘汉墓的几年中间。回国以后，由于被深度卷入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时代风潮，郭沫若在四年中只有几次轻量级的准考古研究活动：1938 年 12 月 5 日与林半觉谈甲骨文入印问题；1939 年 4 月 11 日为金祖同《殷契遗珠》作序；1940 年 2 月 27 日致函王冶秋，并小考社稷墓门拓片两张。第二次较长的中断发生在 1966 年到 1971 年间。这几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郭沫若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并无建树。第三次较长的中断发生在 1974 年到 1978 年间。这中间只有 1974 年 10 月 8 日会见墨西哥考古代表团和 1977 年 1 月在家中和考古所研究人员察看他们送来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文物等几次考古范围的活动。这次中断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四年中，郭沫若因肺炎一共住院十六次，并最终因此去世。

（二）不绝如缕的考古研究活动

1940 年 12 月 25 日郭沫若致函杨树达说：“自卢桥事变发生，弟由日只身逸出，所有研究资料概被抛弃。归国以来，复为杂务所缠，学问事早已久废不讲。”^{[6](P486)} 1942 年 10 月 17 日致杨树达：“弟于古文字之学已抛荒甚久，迩来只就历史逸事编为剧本，已成《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诸种，实一逃荒解闷之策，不足以登大雅。”^{[6](P490)} 1945 年 3 月 19 日、1948 年 4 月 24 日致杨树达的信中也有“旧业抛荒”之类的话^{[6](P491-492)}。1945 年 2 月 11 日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序》中说：“关系彝器

形象的研究，没有插图是不容易明了的。这件事在目前不容易办到。回国以来在这抗日战争的七八年中，我也把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抛荒了。”^{[3](P315)}1956年10月30日郭沫若在卷七《增订序记》中又一次提到“抛荒”：“回忆往年羁旅日本时，曾有蔚为图像学之雄心。事隔二十年，旧业已荒。”这些话还可以列举一些。它们一再被重复，就一再透露着郭沫若对其深重而挥之不去的叹惋。但说旧业完全荒废，又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四十年还是在出考古成果。不过，如果说郭沫若专门的考古研究时代已经结束，而退居次要地位的考古研究活动还在延续，倒是恰当的。因为这四十年从时间上来说，显得很漫长；但这期间产生的考古研究成果，却只占郭沫若同类成果总量的20%。并且，这20%的成果从水准上说，还没有哪一样能和前一时期的成果相比；从规模上说，并无大中型产品。它们除了1973年出的一本名为《出土文物二三事》的小册子（其实它也只是此前发表过的几篇论文的结集）以外，几乎全是论文（这里的“论文”还是广义的，只是为了称说的方便。因为其中有少数关于考古的诗歌、简记、说明等）。

郭沫若考古研究第二阶段的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修订旧作 从1952年到1965年间，郭沫若利用政务的馀暇，将流亡十年间结集出版的考古研究成果通阅一过，并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作了修订。修订的方式或为重组（如将《金文丛考》、《金文馀释之馀》、《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删并为新的《金文丛考》，将《古代铭刻汇考》中的《殷契馀论》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的相关文章组成新的《殷契馀论》），或为校改抽换（对象为《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中的甲骨文、金文拓片）等，修订以后的著作多写了修订说明。